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0
44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著

杨昌裕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美]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著

杨昌裕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834-5/D·260

1992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张 5 3/8 插页 4

定价:9.1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BAC8A/06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行为主义学派在美国政治学界异军突起。它一反美国早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制度为研究重点、以历史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把政治现实中可以实际观察的行为,包括个人行为 and 团体行为作为研究重点,把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在这场政治学研究的变革中,本书作者、美国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哈罗德·D. 拉斯韦尔(1902——1978)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拉斯韦尔于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查尔斯·E. 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以后又获得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博士等学位。曾任耶鲁大学法学教授(1946)、政治学和法学教授(1952——1971),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54),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国际法协会主席(1970——1972),国际政治心理学协会名誉主席(1978)。此外,还担任过许多大学(包括我国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和许多政府机构的顾问。其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1935);《世界政治面临经济问题》(*World Politics Faces Economics*, 1946);《政策学与人口》(*Policy Sciences and Population*, 1975)等。

本书写于1936年,既是拉斯韦尔本人的一部早期代表作,也

是行为主义学派在这一时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如尊重、安全和收入)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精英驾驭环境,达到自己特定目标的主要手段是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作者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罗斯福新政),详尽探讨了精英是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去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继而又根据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阐述了社会变化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对价值分配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还试图对政治发展动向作出预测。本书体现了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组织翻译并出版这部著作。

需要指出的是,拉斯韦尔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作者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他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科学的方法,并力图以此取代传统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由于理论与方法的异趣,作者对政治学的解释,对研究对象的规定,乃至他在诸如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等问题上的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本书还包含一些明显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观点,如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鉴别。

1990年2月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篇 精英

第一章 精英.....	1
-------------	---

第二篇 方法

第二章 象征	19
第三章 暴力	33
第四章 物资	47
第五章 实际措施	62

第三篇 结果

第六章 技能	77
第七章 阶级	91
第八章 人格.....	106
第九章 态度.....	121

第四篇 概论

第十章 概论.....	137
-------------	-----

参考文献提示.....	147
-------------	-----

第一篇 精英

第一章 精英

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

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

在正规的等级制社会中,尊重的分配是比较清楚的。罗马天主教金字塔式等级制度的最高峰由少数官员占据。这些人包括1个教皇,55个红衣主教,22个使徒代表,256个名誉主教,245个大主教和1,578个主教。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是由9人或10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而美国较为松散政府结构,则赋予由9人组成的最高法院、由1人担任的总统和由几百个人组成的议会以特殊的权势。在美国,虽然每个聪明能干、能说会道的青年男子都知道,有一天他也有可能当上总统,但是在上一代人中只有8个男青年达到了这个目标。强有力的美国参议院虽然机构相当庞大,但在每一代人中也只能为480个参议员提供席位(假如没有任何人连选连任的话)。尊重这座金字塔,无论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是难于攀登的。

和尊重的分配相比,安全的分配往往不是那样不平均,并且有时显示出一种相反的关系。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内,有423位君主死于暴力。玻利维亚历任总统中,40%的人在暴力中丧生。这些数字和1921年中美国暴力死亡(包括自

杀)人数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7.2% 形成粗略的对比。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中有 12.1%，天主教教皇有 9% 死于暴力。就整个人口来说，相对安全的情况，则依时代而各不相同。在十七世纪死亡的法国人中，每一千人中有 5 人是在战斗中死亡或受伤的，这个数字，在十八世纪中上升为 12，在十九世纪上升为 13，二十世纪则为 14。

在属于西欧文明的各国中，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很不平均。在百业兴隆和投机活动盛行的 1928 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为 541 美元，是法国或德国人均收入的两倍半(美元价值按 1913 年的购买力计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 368 美元。后来一段时期中，美国在各主要国家中显示了最大的绝对增长，但最猛烈的相对增长则要数日本，日本的人均收入从 1913 年的 22 美元上升到 1925 年的 53 美元。从绝对数字看，英国仅次于美国，1911 年为 250 美元，1928 年上升为 293 美元。俄国从 1914 年的 52 美元上升到 1928 年的 96 美元，这个数字比法国或德国的相对增长还要大些。意大利则从 1914 年的 108 美元下降为 1928 年的 96 美元。

国民收入的分配，在某些社会内部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差别。在 1918 年至 1926 年间，美国人口中的 10% 占有了全部国民收入资金的 $\frac{1}{3}$ 。

上面举出的尊重、安全和收入等几种价值标准都只是代表性的，而不是唯一的、非此不可的价值标准。也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组合来进行政治分析，这样，对精英所做的各种比较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如果选择权势人物的不同特点作为重点来进行政治分析，其结果也会出现差异。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按技能(skill)来进行价值分类。

显然，战斗技能是人们赖以上升的直接途径之一，无论战斗是

以上帝、国家的名义,还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进行,都是一样。穆斯塔法·凯末尔^①曾在1911年意土战争中作过战,1915年他曾在加利波利及其他地方指挥过北部的土耳其部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战火的洗礼。苏联的几个当权人物都是通过非法暴力而不是合法暴力的途径逐步上升的。约瑟夫·斯大林曾在1901年被当局逮捕过,以后转入地下,在革命运动中工作,也经常处于冒险之中。波兰过去的独裁者毕苏斯基^②,1888年因与波兰民族运动有牵连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92年参加了社会党,并组织起秘密军队。

赫尔曼·戈林是“里希霍芬伯爵”空军中队的最后一个指挥官。这个中队在大战后期曾写下过辉煌的历史篇章。国家社会党书记鲁道夫·赫斯是希特勒的亲密伙伴,他曾担任过德国“35”侦察飞行队队员。国社党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赖伊博士和直到纳粹夺取政权之前一直和希特勒保持密切关系的史特拉塞一样,也曾当过空军飞行员。还有许多海军军官,特别是潜艇军官都曾在党派政治中发挥过同样积极的作用。

在与暴力有密切关系的民政职务方面,可以举出罗斯福家族与海军部助理部长职务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作为例子。最初是西奥多·罗斯福,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从1913至1920年曾担任这一职务,后者还在1918年7至9月间负责过对驻扎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部队的检查工作。

美国内阁中政治组织工作的技能向来以邮政部长为代表。在

① 凯末尔(Kemal, 1881—1938),另译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杰出军人、政治改革家、第一任总统(1923—1938)。——编注

② 毕苏斯基(Pilsudski, Joseph, 1867—1935),波兰革命者、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11月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1918—1922),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编注

共产党书记斯大林铲除托洛茨基时，组织技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希特勒擅长演说和组织，是二者的卓越结合，墨索里尼兼有演说、新闻工作和组织工作三方面的特长，马萨里克^①则同时具有演说、新闻、学者和组织各方面的特长。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政治委员会采取以更多的组织技能代替演讲、新闻与学术技能的办法已经逐渐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

依靠某些重要的象征来处理关于人的问题也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包括使用像演说、辩论文章、新闻故事、法律辩护、神学论争、带有一定目的的小说以及哲学体系等各种传播媒介在内。在物质环境由于技术的扩展而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人们靠熟练地使用象征来谋生的机会正在迅猛增加。例如，自1870年以来，美国职业著作家的人数已从原来微不足道的数字跃升至12,000至13,000人之多。艺术家的人数过去是4,000，现在已有60,000了。演员由过去的2,000发展到现在的40,000，音乐家的人数已经不是16,000，而是165,000。教师业的人数增加了10倍。1870年时只有1个新闻记者的地方现在有了10个。今天共有300,000名律师。律师在法庭、立法机关、各种调查团、董事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总统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人是律师出身。

和处理人的问题的情况一样，现代处理物的问题的专家人数，也有了惊人的增长。在美国，技术工程人员（不包括电工在内）从1870年的7,000增长到1930年的226,000以上（整个说来，挣工资雇员的增长率仅为300%）。但是，和运用象征影响群众的专家相比，工程专家所受到的尊重却要少一些。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现代工业飞速扩展的情况下，讨价还

^① 马萨里克(Masaryk, Tomáš, 1850—1937), 哲学家, 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编注

价的技能顿时成为通向飞黄腾达的捷径。

除技能外,精英还可以从阶级方面来进行比较。阶级是具有类似职能、地位和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当今世界政治上,主要的阶级结构分为贵族阶级、富豪阶级、中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

1925年德国地主贵族阶级拥有占全国可耕地20.2%的大地产中的绝大部分。易北河以东土地的40%都属于他们。总的说来,这些大地产在德国全部土地占有户数中仅占0.4%。处在这座金字塔底部的是大批只占有小片土地的人:占德国全部土地占有户数59.4%的人仅占有可耕地的6.2%。

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贵族阶级手中的情况,在智利特别明显,官方统计表明,在57,000,000亩私有土地中约有50,000,000亩掌握在2,500个人手中。在战前的匈牙利,1,300亩以上的产业只占全国土地占有户数的千分之一,其土地面积却占总面积的17.5%。在以前沙俄帝国波罗的海各省,贵族阶级占有大片土地的情况更为突出,以致像爱沙尼亚这样的新国家在其成立之初就发现,仅1,149个大地产就占据了土地总面积的58%。有一半土地属于封建贵族房地产的拉脱维亚,在1922年土地改革中,就设立了43,000个新的农民土地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商业、工业和金融各方面逐渐兴起了一批庞大的富豪集团。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约翰·雅可布·阿斯特财阀,这个家族从与东方国家做买卖、搞皮毛生意以及在纽约进行不动产投机等活动中积累了20,000,000美元的财富。工业财阀的兴起稍晚一些。范德比尔特从铁路投机中获得了100,000,000美元的巨资。麦考密克靠农业机械起家,卡内基靠钢铁,洛克菲勒靠石油,摩根则靠银行投资活动起家。到1929年左右,在美国收入超过百万的富翁共有504人,他们的财富总计达35,000,000,000美元。这些庞大产业一般说都是五花八

门、无所不包，它们在名义上控制着正在遥远地区进行着的各种计划与活动。

十八世纪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阶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却很快地与日渐衰落的贵族阶级融为一体。在1913年，德国最大的富翁虽然是新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拥有70,000,000美元的克虏伯财阀，但仅次于他的第二大富豪却是贵族东纳斯马克王子。德国皇帝居第五位。这些贵族财产大部分也都变得五花八门，依附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上面。

贵族阶级为新的社会结构所逐步取代的情况在一项对十九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内阁大臣的分析中显示出来。哈罗德·J.拉斯基指出，在1801——1831年间，71个英国内阁大臣级官员中至少有52人是贵族阶级的儿子。1906——1916年间，贵族儿子在51位大臣中只占25人，他们的人数降低到了与其他社会阶级均等的水平。从1917年到1924年，53位内阁大臣中只有14人是贵族出身的。

在日本，这种向现代工业化与现代金融的过渡是通过把新企业分配给一些大封建家族来实现的。

下层中产阶级是由一些靠技术换取微薄金钱报酬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阶级包括小农民、小生意人、低工资的专业人员、熟练工人与工匠。体力劳动者则是指那些没有专门技能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关于如何划分富豪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政治实践中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科学家们的意见也很不一致。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有时企图把熟练工人，甚至把低收入的专业人员都包括到无产阶级里去。而富豪阶级的宣传家们则把“企业”说成一个整体，企图把大企业、大财主与小企业、小财主之间的区别加以抹煞。

阿瑟·N. 霍尔库姆把布哈林对这些词所下的定义应用于美国,得出如下的结果:把24,800,000个雇佣劳动者和14,000,000个家庭主妇归入“无产阶级”项内,所得出的“无产阶级”的数字中有51.7%是雇佣劳动者,1.6%是资本家,8%是地主,剩下的则是些“两者之间”、“过渡性的”、“混合的”和“未分类的”。据W.I. 金估计,1924—1927年间美国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约为1,885美元。实际上“无产阶级”中有很有一部分——尽管数目不详——的人所得的收入超过这个平均数。

在那些为了获得技能而作出过牺牲的人们心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想法,这种心理上的联系倾向于把小资产阶级从没有技能的无产阶级一边拉向富豪阶级一边。另一方面,地位低微的专业人员、商人、农民和熟练工人由于对一种没有保证把高报酬分配给技能的社会制度普遍感到不满而趋向于远离那些保全富豪阶级的社会结构。霍尔库姆划入“无产阶级”的人们中既有半熟练与不熟练工人也有熟练工人。因此,按照这种理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属于小资产阶级。资料证明,在美国生活中,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一直在排挤和取代着体力工人。据估计,机器革命已经把美国工人人口中约计25%的人从艰苦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省劳力的机械也减轻了那些留在农村、矿山和工厂中的人们的负担。1870年时,有52.8%的雇佣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到1930年,这个数字下降为21.3%。这些变化大部分发生在商业、运输业(从9.1%上升至20.7%)、办公室工作(从1.7%上升至8.2%),和专业服务机构(从2.7%上升至6.5%)等方面。

除了技能和阶级以外,还可以按人格来考虑价值的分配。临床心理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所熟悉的各种人格形象都取得什么样的相对成就呢?受虐狂者、施虐狂者、与世隔绝者、癯病患者、着迷者、受迫害者,这样一些心理变态的人各自都有什么样的命运呢?从这

个观点来考察,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是围绕着阶级与技能打转,而变成一连串的人格形象了。

这里,引起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因受先天及早期教养的影响而倾向于以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特殊角色以求得满足的人格形象。鼓动家就属于这一类型。他那种渴望从同龄人方面受到迅速而热烈的崇敬的强烈欲望使他从他的同伴中分离出来。这种人感情上倾向于用演讲术和报刊辩论文章这些取悦群众的技能来培育和武装自己。而那些不太惊人的组织家则是对激动的反应需求较小的人。鼓动家在危机的紧急关头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而组织家则在危机的间歇期受人欢迎。在危机加剧时,阿斯奎斯^①让位给劳合·乔治^②;兴登堡^③让位给希特勒。危机的缓和则为鲍德温^④或哈定^⑤登上舞台准备了条件。

在危机的早期阶段,那些兼有坚定与仁慈、体谅多于残忍的人格会一马当先加速前进。因为出现在战争或革命前夕的压城乌云会在群众中引起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在灾难即将到来之时,渴求保证与放心的需要使温文尔雅的林肯比性烈如火的西沃德^⑥更受欢迎。

① 阿斯奎斯(Asquith, H. H., 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1916年因战事失利和国内发生都柏林起义,被迫辞职。——编注

②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擅长演说。他的社会政策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先驱。——编注

③ 兴登堡(Hindenburg, Paul von, 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编注

④ 鲍德温(Baldwin, Stanley, 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至1937年间3次任首相。——编注

⑤ 哈定(Harding, Warren, 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编注

⑥ 西沃德(Seward, William, 1801—1872),美国南北战争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政治活动家。1861—1869年任国务卿。——编注

存在着一些对专横暴力很容易发生迷恋的人格形象。他们学会了用极度强烈的专横任性来威吓周围的一切。他们以向外转移自己对困难处境的愤怒作为方法，在统治中得到了成功。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

不管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对尊敬所具有的强烈的要求。当这样一种动机与纵横捭阖的技能相结合，又遇到适宜的环境时，一个活生生的政治家就会应运而生。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在充满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实现他的命运的。他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

真正的政治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成品。当婴儿刚刚出生时，他们对附近的或遥远的环境还不具备相关的概念。他们的感情冲动最初只是针对周围亲密的小圈子组织起来的。在这个初始阶段，与客观世界相关的各种象征开始具有了意义。而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则学会了把公共事物组成的世界用作减轻他周围环境中各种压力的一种手段。对尊重的强烈欲望在亲密的小圈子中一旦遭到挫折或过分纵容时，就转向更大的环境去寻求表现。于是在各种似是而非的符号的名义之下，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被合法化了。他给人们的暗示是他的行动并不是以行动本身为目的，是为了上帝的光荣，为了家庭的神圣，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阶级的解放而在那里努力奋斗。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政治活动家不受周围环境中任何具体事物的约束。他对那些在科学、艺术和技术中可以辨认的自然界的常规毫不在意，他所关心的只是客观事物对他的自我在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除了上述各种技能、阶级及人格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态度群来考察价值分配的情况。那些把对国家、对民族、对阶级、对行业、对个人共同抱有的忠诚信念作为权势基础的权势人物把世界

弄得四分五裂,各据一方。这些人中,有的是以好战的或妥协的方法为名,有的是以对一系列政策所提出的要求为名,有的是以对将来的乐观前景为幌子达到显赫一时的目的的。彼此大不相同的人格类型可以在对国家或对阶级忠贞不渝的信念上,也可以在方法、政策、前景上联合起来。这样,态度群就像打破技能或阶级的划分一样,也打破了人格的分类。在任何确定的时刻,某一技能群或阶级群的成员都不会达到充分高度的技能意识或阶级意识。虽然一个客观的观察家能够看到某些事件对他们各自的成功或失败所具有的意义,但这些技能群或阶级群的成员却可能没有共同的技能或阶级信念,而又都说着相同的爱国主义语言。

在这里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也许还比较合适。政治学一词已经被用作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研究这个意思。然而,很明显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权势的一个侧面是对价值的相对分享。使用的价值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尊重方面的精英并不一定就是安全方面的精英。除了我们列出的三种价值(尊重、安全、收入)之外,还可以加上更多的价值。不管表上列些什么,其中的项目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从而得出与对精英的不同评价相对应的不同结果。除了作为对价值的相对分享之外,如果用其他的词来给权势下定义还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果。也可以用某个词来表示,一旦在价值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对于价值可能受到什么影响的一种判断。这样就可以判断在发生一次假想的冲突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家是强于还是弱于工业资本家。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不能期望得到静止的肯定结果的。不断的再检查必然会把世界的许多新现象带到我们严肃注意的中心点上来。对于专门的政治学者说来,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就是“权势和权势人物”、“权力和当权派”的丰富与多变的涵义。

也许读者要考虑,从迄今已讨论过的那些观点看来,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什么位置。我有什么主要技能呢?我所属的阶级是什么呢?我的人格属于什么类型呢?在集体政策和态度方面,我的忠诚和喜好如何呢?这些技能、阶级和人格的形式与我的这个地方、我的这个地区、我的国家、我的大陆、我的世界中尊重、安全、收入等等价值的分配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我的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我的位置曾发生过什么变化?在我死去之前,还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呢?

显然,最后一问以非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思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时代的征途上确定作为众多客体之一的自我这个客体的位置。目标是在包括过去以及将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前后原委中正确地看清自我。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就是通过时间来为一系列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形象指明方向。

这就是研究政治事件的思考法。但是,还有一种方法,称为应用法。用这种方法观察事件是为了发现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这一观点,虽然能使分析者的态度更接近于鼓动家-组织家的态度,但它并不一定要求公开参加革命或反革命运动,公开参加改良或反改良运动。如果用这种方法观察事件,那末,在思想家重新恢复用思考法进行分析研究时,这种个人卷入的新鲜感觉就会对他起增强活力振奋精神的作用。

精英们是怎样受到攻击或受到保护的?如何通过利用象征、暴力、物资与实际措施等手段来达到特定的目标呢?这些就是在此处所提到的对政治的应用研究法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也是将在下面四章中提出讨论的问题。之后再恢复使用思考研究法,并根据技能、阶级、人格、态度来阐释事件的意义。

把目前这种对政治的解释与近代关于这一题目的专门思潮对比着进行观察,也许是有用处的。直到1906年之前,美国还没有足

够多的政治学家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虽然美国经济协会是在1885年成立的)。这个协会的最早会员来自政治学院(或系),也来自一些历史系、哲学系以及部分法律院校。这些政治学家虽然掌握不同的技术技能,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却是大家对于所称的政府制度的共同兴趣。政治学与法律和哲学有区别,它研究的是比较政府,着重研究引起现代特别是西欧及英语系统各国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重大历史变革。

近几年来,院校政治学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共管理、政党、宣传团体和政治人物等各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论述内容。政治学家们更多地倾心于近期的过去和最近期的将来,而不是遥远的过去。这种注意力中心点转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采用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律师在传统装备中没有包括进去的一些研究方法。

对近期的过去与最近期的将来的研究把注意力带到了访问和现场观察的技巧上面。这就使得更多的政治学家去和那些擅长于访问原始民族(文化人类学家)、精于猎取个人生活史文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善于进行长时间技术性会谈(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专搞控制观察(行为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应用心理学家)的各种专家们进行接触。

专心致志于近期过去和最近期将来的政治学家们对各类多发性事件(如投票)进行了研究。这就使得运用数量程序来比较所得的结果成为可能,从而使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由此可见,政治学家在解决他的问题时可以指望得到帮助的不是仅限于历史学家、律师或哲学家,而是在学术分工中新兴起的、日益壮大的技能群。

显然,这种视野的变化可能要在政治学家的技巧和观念上引起变化。一些人已经对于把他们研究的范畴和“政府”或“国家”等

同起来表示不满了。他们发觉传统的政治学词汇已经难于适应对各种有关变化的论述了。传统上只有“主权”与“非主权”，“国家”与“非国家”、“集中”与“分散”的区别。但是，大多数事件似乎处于这些“非此即彼”的用语之间，要求我们的语言能够在“多或少”之间作出区分。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把世界上的国家分类为“专政制度”与“非专政制度”，但是这种两个字的分类法似乎并不特别重要。因此，对不同程度的“权力”或“势力”的兴趣，和对“权势”一词采用试验性及局部性表示法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

政治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权势人物身上并不意味着对整个社会中各种价值的全面分配忽视不管。不考虑多数人，就不可能确定少数人。着重研究少数人取得多数东西的可能性并不表示多数人从政治变化中得不到好处。

此外，按某些价值（如尊重、安全、收入）来对政治结果进行分析也不意味这些结果或价值都是有意识地谋求得来的。决定自觉努力的影响如何是需要调查研究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极少量的“阶级意识”和“技能意识”却能产生出“阶级后果”和“技能后果”来。实际上感觉到的主观态度对阶级或技能群的相对影响可能起破坏而不是促进的作用。这样的态度就是“虚假阶级（或技能）意识”，而不是“真实阶级（或技能）意识”。

所以，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决定权势的基础是在那些为了分析目的而选用的价值中所占有的份额。有代表性的价值是尊重、安全和收入。在权势的测定上，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通过连续应用特定的标准，就可能使情况得到澄清。不管使用什么标准，注意力都应集中在权势人物的某些特征上，这些特征可以用阶级、技能、人格和态度等专门选用的词汇来加以描述。精英操纵或驾驭环境的方法——即运用暴力、物资、象征、实际措施等——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书将以权势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作为开始,而以对权势人物所产生的后果作为结束。

第二篇 方法

第二章 象征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即反对派精英(counter-elite)所谓的“空想”。精英利用各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言词和姿态从群众中骗取血汗、劳动、税金、赞扬。在政治制度运转正常的情况下，群众对这些象征推崇备至；向来伪善而大胆的精英才不会因为感到不道德而产生痛苦。总之，“上帝在天——世上一切都好。”“联合起来就是力量”——不是剥削。

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一个对自己毫无忧虑的国家多么幸福啊！至少少数几个从普遍默认中得到主要好处的人多么幸福啊！在群众受着信心的驱使，而精英又满怀自信的情况下，那些将特殊利益给与他人的生活制度是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活动的。

任何组织严密的生活方式都要按照自己设计的模式来塑造人的行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必须从人的襁褓时期开始，直到他埋葬入土之日为止，反复地进行灌输。在作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个人成就与个人责任的生活从(一个人)有知觉的一天开始，就在歌曲中和故事中被吹捧上天。储蓄硬币的扑满灌输着勤俭节约的习惯，在校园中

搞贸易活动传播着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学校中个人得分的制度在同学们之间造成竞争性的差距。“成功和失败全在你自己。”“努力就能成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努力去干,就会成功;如果得不到成功,就是你努力不够。”

“金钱万能”:钱是珍贵的,所以“现在去买自行车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节约,把旧汽车再使用一季”;“他们快进贫民院了,你没看见她的穿着么?”“他们是高尚的人,但她是一个败类,丢了她父母的脸”;“他们为遗嘱问题发生了争吵”;“她是为了他的钱才和他结婚的”;“有人说他毒死了她,这样他就可以得到那笔保险金了”;“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他嗜酒成癖,把自己毁掉了”;“他本来是一个挣钱养家的好手,后来他四处玩乐,把钱都花到一些放荡女人身上去了”;“我听说哈里经营房地产发了大财”;“这东西花了你多少钱?”“那所大学的学费是多少?”

富有的、成功的叔叔,富有的、成功的执事,富有的、成功的校友,富有的、成功的银行家都成了奉承别人或是炫耀自己的谈话焦点。这些人的画像装饰在墙壁上,他们的半身铜像点缀在客厅中,他们的出现为各种聚会增添光彩。在“失败者”谋求捐助,或进行偷窃,或从事其他更坏的勾当时,无论在餐桌上,或托儿所里,或大街拐角处都能听到对“失败者”鄙视的称呼。

日常谈话、小说、电影都支持个人对成功或失败负责这个主题思想。他失败了,因为他不够机灵,或者说话时口臭,或者他没有学完函授教育的课程,或者上错了大学,或者他忘记把头发弄得光亮些。她成功了,因为她口红涂得恰到好处,因为她在家里通过电唱机学习法语,因为她把皮肤保养得使你不禁想用手去摸,因为她买的内衣柔软而又精巧。假如她从事打字和速记,她可能和她的上司结婚。下面这些影迷们经常看到的影片在表现突然成功这一主题上是相当典型的:在《我不是天使》中,一个过去在巡回演出团担任

演员的姑娘和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结为伴侣。在《壮丽的早晨》中，一个一心想当演员的农村姑娘在一出剧的首场演出中被推出去担任角色，并且获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在《我的弱点》中，一个装扮成夫人的女佣人把一位上流社会人士搞到了手。在《琼斯大帝》中，一个黑人搬运夫在他遭到失败之前，登上了帝王的高位。在《舞台游行》中，一个年轻的制片人，因一个夜晚的紧张工作而获得成功。

所有社会的和工业的困难都自动地被追溯到个人因素上面。如果某某公司的煤矿陷入了非常悲惨的困境，那是因为远在纽约的主人们并不知道此事。同时，麻烦可能是由一些煽动家或敲榨勒索分子制造出来的，他们为了使自己能以罢工领袖或罢工破坏者的身分受资本家雇用而去煽动人们。

这样，注意力的焦点都被集中到了一些个人问题上面。报刊报道说，他杀了她是因为他发现她和另一男人在一起，或者是因为她不容许他去找另一个女人。报纸报道说，他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作了一次漂亮的演说。报纸报道说，他被轧死，是因为他忘记了看一看是否有火车正在开过来。报纸还报道说，她受了伤，是因为她没有看看包装上的说明。报纸并不是把某一单独事件和许多与它有关的事件联系起来，把它当作一个代表来加以描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从属的通讯工具的主题不是失业所造成的绝望，不是收成不好所造成的不安定，不是禁令重重所带来的行政工作效率的降低，而是个人动机和个人奋斗。

当这种思想意识从始到终浸透了生活的时候，集体责任的论点便会在不理解的墙头上碰得头破血流。在任何集体社会中，生活经验的全部组织结构都必需重新加以编织。例如，在苏联，就已经在改造下一代人的心理环境上作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意味着修建大批集体房舍，以使用公共洗衣房及其他类似的服务设施去取代私人单位。为了把集体的企事业，而不是野心勃勃的个人放在注

意力的中心，集体任务取代了个体任务。戏剧演出强调的不是演员明星，而是剧本，表现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各种运动的命运。

那些象征有组织社会的标志和用语是人类处于朦胧状态下的早期宝贵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与所有人的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有：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飘动在微风中的国旗、在特别节假日唱得不太整齐的美国国歌；每次学习和朗诵前重复进行的忠诚宣誓；在学校、教堂、俱乐部里进行排练的早期清教徒殖民者移居美洲的壮丽场面。这些记忆中，还包括当提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亲友的名字时那种严峻不安的沉默；和舰队、陆军及空军在一起参加旅行和冒险的故事；为死者而唱的严肃的安灵曲；穿着灰色、蓝色喇叭军服的行军队列。

在像总统举行就职典礼那样的场合里，国家统一的象征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表达这种象征所使用的词语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在南北战争以前，常用的词是“联邦”(Union)，但因这个词与流血的和存在激烈争议的历史有连带关系，所以在南北战争以后的总统演说词中已被取消不用了。“合众国”(United States)一词退下来，让位给“美国”(America)或“美国的”(American)的情况，在世界大战^①后变得十分明显。在就职演说中总是包含着与神或上帝有关的说法，还经常使用像“自由”、“自由权”、“独立”、“经济”、“自主”一类的词。甚至连乔治·华盛顿都曾提到过“共同的过去”，而自富兰克林、皮尔斯以后，“我们光荣的过去”和“我们的回忆”就正式受到赞扬了。像“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列祖列宗、创业者、建国者、我们的先贤们、英雄们”这些说法很少被遗漏。“对未来有信心”仅被门罗和克利夫兰二位总统删去过。“党派偏见”在大多数

^① 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下同。——编注

演说中，都是以批判性或贬抑性的口吻提及的。还经常出现一些像“我们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正义的人民、我们伟大的国家”等一些自我赞美的说法。

在漫画中反映出来的公众绘画语言里面，外国的形象除了公众的同情心偶尔对他们有利外，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多少年来，“墨西哥人”的模式总是包括一件短上衣、一顶很大的阔沿帽、踢马刺、左轮手枪和来福枪。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有时穿着打补丁的鞋子，光着脚板。黑黑的头发、有点向上翘起的胡须、黑眼睛、紧握着的拳头、带着挑战表情的面孔，这一切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仇恨倒不如说是烦恼。有时漫画上的“墨西哥人”是一个应当狠狠地打他一顿屁股，让他上床去睡觉的一个又瘦又小的顽童。有时他被画成正在玩火，或者正在朝山姆大叔吐舌头，或者正在搞恶作剧时被住在他北面那个当警察的邻居一把抓住的样子。

在1915年前，“日本人”到底应画成什么模样，还没有一定之规。最初，他是一个小孩，或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小个子男人。直到1915年5月，漫画家鲍尔斯画笔下的“日本人”还是一个穿着一身长不过膝的和服、背后打着大大的蝴蝶结、赤裸着胳膊和双腿、剃着光头、满口白牙、手持梭镖的形象。到1915年，趋势转向于抛弃和服，而给“日本仔”穿上一身军装，通常是一件短短的普通上装（不带装饰品）、一条长裤、一双紧梆梆的长统马靴、军帽、军刀，经常还有一支手枪或一把刺刀。有时候，特别是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仔”在图画里穿的是一套普通西服；但是到了1925年，又给他重新穿上了威风凛凛的全副武装。

漫画中，没有一个表现公众从公共支出中得到好处的固定模式，这个事实突出地表明了反政府的倾向性。整个侧重点被放到了“纳税人”上面。“纳税人”通常穿白衬衫、黑西服，打着活结领带，有时穿白色背心，经常穿条单薄的长裤，他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可怜

虫。这个过去用草帽、圆顶礼帽或者大号牛仔帽装备起来的人，现在通常都把一顶大小不一的软毡帽或搁在脑袋顶上，或压在耳朵外面。穿的鞋可能破烂不堪，而且打着补钉，然而那条高贵的白领却始终巍然留在那里。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头发稀疏，鼻子很长，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在1921年左右，他的夹鼻眼镜换上了牛角框子。“纳税人”和“公众”不一样，他总是被搬到舞台上表演角色。他可能是一个准备牺牲的以撒^①；一个扎着绷带、正要离开民主党医生的办公室，准备到共和党医生那里去求得救治的跛子；一个正在把五艘大号巡逻船拼命向着一个废料堆划去的划手；一张锯木架，政府的铺张浪费像一把锯子正在它上面剧烈地摇晃着。

非常奇怪的是，许多年来“资本家”的模式一直保持着不受人赞美的老样子。格子花裤子配黑色外套和一套格子花衣服的穿法在1910年至1911年间逐步让位给黑色衣服或黑色外套加有条纹的长裤。白色背心、飞翼形领、蝴蝶结（或活结领带）、不同尺寸与不同高度的烟筒礼帽很早就已经包括在这个模式之中。所戴珠宝的数量各有差别。有时候他用钻石的前胸饰扣或领带装饰别针、袖口链扣和钻石戒指装饰自己，甚至大拇指和食指上都戴着戒指。到1912年和1913年时又添上了鞋罩，闪闪发光的漆皮鞋成了固定装饰。有时候还要添上大雪茄和一根大手杖。“资本家”总是肥肥的脖子、圆圆的肚皮、秃脑袋。为了强调他贪婪的特性，他的两只手有时被画得格外肥大。在损害“劳工”和“公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时候“资本家”总是咧着嘴大笑或者露出喜笑颜开的模样。但是到了1919至1921年间，反面象征变成了被打扮成穿着绸子衬衫、傲

① 以撒(Isaac)，《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人第二代列祖。上帝曾命亚伯拉罕以以撒为牺牲献祭，亚伯拉罕准备遵从上帝的指示，但上帝开恩保存了以撒的性命。——编注